

单地

· 杂人 ·

暂凭杯酒长精神：李炜教授追思

李晓璇、和亚旋

2019年5月6日，我们的恩师、中山大学中文系李炜教授与世长辞。

恩师走后，我们与他的家人、师长和各界友人一样，陷入了淙淙的悲痛之中。为了以更好的方式追思、缅怀李炜教授，在学校的关心支持下，在诸位师长的主持下，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开始了为恩师整理编撰一本学术论集、一本追思文集的工作。

经过近十个月的准备工作，现在《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终于克服困难，按计划于李炜教授逝世周年之际付梓。回首这十个月的经历，有许多人、许多事，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应似飞鸟踏雪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鸟踏雪泥”，这是苏轼《和子由浥池怀旧》中的名句，也是李炜教授的父亲——兰州大学李东文教授在他的著作《鸿爪雪泥》后记中的开篇语，更是这本书题名的由来。李炜教授生前很看重老先生这本著作，也将“鸿爪雪泥”的精神引为人生信条。

熟悉李炜教授的人都了解，钱财他是不甚看重的，功名也每常是可以“让”的。若说他身后最大的遗产，应该是倾注了毕生热爱和心血的学术研究，以及传递给身边亲人、朋友、学生那些正直、善良、洒脱、坦荡的人生态度。

这些财富不应该隐没，更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属于全社会，应该在更宽广的时间和空间里，带给更多人前行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当我们还在酝酿筹谋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的庄初升、刘街生、林华勇等诸位教授就想在了我们前面，他们坚定地表示：把李老师的文章整理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老师们不只是明确表态，更对编辑出版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且在项目刚刚启动、一筹莫展的时候，身体力行地主导了前期的筹备事项。学术论集和追思文集两书同编的构想，就是由老师们最早筹划并提出的；将李炜教授的学术文章整理结集，同时将师长、同事、学生、亲友及社会各界纪念李老师的文作另外单独结集，形成两本配套的纪念书籍一同出版。此等设计不可谓不用心、考虑不可谓不全面，非真心关切不能提出。

庄初升教授还早早地慷慨宣布，书籍出版的经费由他个人来支付。这在最初筹划两书、各项事宜尚不明朗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剂稳心定神的强心剂。2019年下半年，庄老师奉调浙江大学，临行前还专门跟我们见面，谆谆嘱咐一定要做好两书的整理编辑工作。

林华勇教授聪明眼亮，一直在积极谋划，斡旋寻求各方支持，促成出版计划。庄师、刘师、林师在书籍的编辑整理过程中，也是主导把关、事无巨细，大到整体方向、工作节奏，小到设计编排、遣词用字，都是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审阅、修改。

原中文系办公室詹拔群老师，热心支持《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争取系里的支持，将其列为中文系之“中国语言文学文库丛书”。詹老师熟悉从书的申请和报批工作，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填报各项信息，帮我们顺利完成了前期各项审批流程，即使在调离原工作岗位之后，詹老师仍一直关心两书的出版工作，不时帮助我们解决各种报批中的疑难问题。

在各位师长的主导和支持下，《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简称《论集》《追思集》，下同）两本书的整体方案很快得以成型。但随之而来的整理编辑工作，也让我们感到压力山大。

《论集》的内容是李炜教授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学术论文，这部分工作主要是收集、分类、整理、校对以及向论文发表的原刊物申请收录许可等。虽然皆有存稿，但这些文章有些发表年代甚早，有些发表在境外刊物，要想尽数收辑、通统体例，也并非易事。

更让我们担心的是《追思集》，其中李炜教授逝世时，除了师友们撰写的挽联、唁电和部分追思文章以外，其他部分完全是一片空白，这本书的实际撰稿人将会是李炜教授生前的师长、学生、各界友好，作为编写人员如何联系他们，向他们约稿呢？我们希望能够为恩师逝世周年之际，完成两本书的编写出版工作，《追思集》的编写时间尤其紧迫。焦虑感和紧迫感笼罩了编写团队的每一个人。

我们最终还是在按期完成了两本书的文稿收集和整理工作，这还不仅得益于编写团队的通力协作，更要归功于各位撰稿前辈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在两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恩师早年的经历，也收获了许多许多前辈们带来的难忘的感动。

人生难得相知心

回首两本书的编写过程，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诸位师长、同事、亲友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



李炜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唐钰明先生，将他视作自己的儿子。李炜教授逝世，唐先生之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唐先生不仅强忍悲痛应承了约稿，为《追思集》撰写了一篇《魂兮，归来》的悼文，还打破了自己“不为人作序”的规定，“义不容辞”“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论集》作了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唐先生还为两书担任顾问，不仅亲自审定《论集》的内容，还主动帮助我们联系学界前辈，邀请他们为《追思集》撰文。

“数月以来，梦魂萦绕。李炜呀李炜，你可知你父母揪心地思念你吗？你可知你的老友们盼望着和你杯盏交错吗？你可知我和师母天天等着你‘汇报’吗？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不信神也不信鬼，可我希望你能够重视人间啊。我禁不住大叫一声：魂兮，归来！归来！归来！！！”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唐先生与李炜教授深厚的师生之谊，都令我们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中山大学黄天骧先生在李炜教授逝世第二天，就在媒体上发表了悼文与挽联，而且非常关注两书编辑工作的进展，还亲自指导两书中各项内容的编排和设计工作。

暨南大学邓敬敏先生在编辑工作初期，多次打来电话关心两书的进展，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还在编写组成立的第一时间将纪念文章发来，文中那句“李炜兄弟”饱含的悲痛与不舍，令人动容。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先生细读完了李炜教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的七篇论文，才提笔写下《人已去，文尚在》，高度评价李炜教授的学术成就，并鼓励我们继承李炜教授的遗志，做好研究工作。

我们在开会时偶遇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忐忑之中当面向陆先生约稿，陆先生不仅一口答应，还向我们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于李炜教授早逝的惋惜悲痛之情，并在回北京之后立刻写纪念文章发来……

《追思集》中，这几位学界前辈们是年龄较长的撰稿人，也是最早一批寄来文章的撰稿人。他们对于李炜教授的深情厚谊、对于此次编写工作的关心帮助，我们将永远铭记。

李炜教授幼时曾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学艺，与文艺结缘。在学术研究之外，文艺是李炜教授着力最多的第二事业，也曾和文艺界的好友们合作，留下许多为人称道的作品，邀请文艺界好友追忆过往是十分重要的篇章。

我们向中大校友、词曲作家陈小奇先生约稿时，陈小奇先生回复“给我些时间，近期事很多”。然而一周后，我们就收到陈小奇先生的文章，追忆了他跟李炜教授20年来“山高水长”的交往故事。青年舞蹈家王亚彬女士在收到我们的约稿信时，正在繁忙的巡演路上，但是立即回应允允，并在巡演途中写下了追思文章。

这些文艺界友人的文章，为我们还原了一个为广东文艺和中大文艺亲力亲为的李炜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前辈接到撰写纪念李炜教授文章的约稿函时，内心都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很愿意以这种方式纪念和追思李炜教授，但心中也充满了伤感和悲痛。很多撰稿人说，他们从回忆到落笔，都经历了从纠结到平复，再纠结又平复，这样不断地整理情绪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好友王箭老师，常年旅居英伦从事科研工作，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特别认真地对待这项“任务”，先后拨来三通越洋电话，回忆与李炜教授交游的往事，沟通有关撰稿的想法，认真地记录我们的反馈意见，最终熬了几夜才写好这篇追思文章。

一直陪伴李炜教授对抗病魔的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王奕晖医生，在写作追思文章期间，给我们发来多条微信记录，讲述了她印象中多面的李炜教授。她说李炜教授是一个不够听话的病人，总是把繁忙的事务放在第一位，但也是一个让她骄傲的病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顽强地与病魔斗争。

中山大学校友、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百忙之中为《追思集》作序，开头第一段即是“好几次准备

动笔，最后都因各种原因岔开去。我明白，自己潜意识里，一直在回避这篇文章。”像王箭老师、王奕晖医生、陈平原教授的写作历程，在《追思集》的撰稿人中不是少数。

除了这些发来稿件的撰稿人外，还有几位我们已经约稿、却最终未能发来稿件的撰稿人的故事，亦值得一记。李炜教授的结义兄弟许会斌先生，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感谢编写组的努力之余，也提出还是希望把这份多年的兄弟之情留存在心底。李炜教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好友、北京大学出版社杜若明老师亦是如此。

对这些前辈的选择，我们虽有遗憾，但也深受感动，他们确实把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看得比金子还要贵重。我们在理解之余，更觉万分可敬。我们这些80后、90后学子，入李炜教授的指导下读书的时间较晚，向各位父执辈约稿的过程，也是我们用一点一滴的信息，不断拼凑出一个更加完整的李炜教授形象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发小、安博教育集团的黄钢先生，发来的追忆文章《追念那个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让我们知道李炜教授从小就兰州女子师范学校（李炜教授母亲原工作单位）家属院的孩子王，“小时候他就展现出了超强的领导力”，自封“司令”，“经常是他在院子里口哨声一声呼啸，孩子们纷纷放下饭碗，冲到院子里集合”。李炜教授的大学同学、甘肃省博物馆的张东辉老师，发来的追忆文章《斯人若彩虹》，提到大学时期的李炜教授是班级活动中的灵魂人物：

“他语言天赋极高，表达能力极强，方言土语、京腔北调，张口就来，模仿到位，恰如其分，不管是正襟摆知识，还是席地侃大山，他总能洋洋洒洒、亦庄亦谐，引得满堂人前仰后合！”

黄伯荣先生的三女儿黄绮仙女士回忆李炜教授考研的成绩特别突出：

“父亲说，当年李炜考他的研究生时，他原计划招两名学生，但李炜的成绩太突出了，比第二名竟高出五六十分，最后我父亲就只收了李炜，想把心血都倾注在其一人身上。”

而1986年，黄伯荣先生唯一的儿子不幸过世时，“李炜第一时间就赶到我父亲的身边，安慰导师说他就是导师的儿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一定照办，做好服务。”

中山大学欧阳光教授回忆中文堂大堂的端砚池和上方悬挂的中文系系徽，都是李炜教授参与设计与安放的。“安装那天，他在讲学厅前后左右跑上跑下挥汗如雨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赞叹“炜兄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热爱并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中文系，但他的精神其实已经凝聚在中文系的这些标志里，不可分割，必将与中文系一起永存！”

在年长的师兄们笔下，我们也了解了早年间那个意气风发的李炜老师。中山大学中文系90级的李兴文师兄写道：

“1990年秋天，还是讲师的李炜老师那英俊的外表、洒脱的身影、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的授课和那张永远带着微笑的脸深深镌刻在同学们的心中，赢得了一大票‘炜哥粉’（我也毫不意外地成为其中之一）；我宿舍就有一半人因李炜老师的一句话而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

92级的高伯齐师兄回忆道：

“我上学期间和毕业后几年跟着他参与了多个大型晚会的策划，那时候社会上热衷于办晚会，而他是大师级的策划家，广东省内一些顶级的活动、经典的晚会都有他的影子。2004年中大80周年校庆，学校让他负责整个庆祝晚会，他很快就集合了广东省内影视歌舞等方面的‘大腕儿’们，并挖掘出校内各方面人才，晚会最终赢得众口交赞，留下不少经典，中央电视台更是前所未有地播出了长达40分钟的节目。”

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恩师往事，并没有消散在光尘之中，而是被亲历者一一细心收藏，永远地保存在记忆深处。感谢这些亲历者的分享，在《追思集》中，我们得以重温李炜教授的笑容笑貌、品格风范。

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这三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

言有穷而情无终

在过去的大半年中，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我们整个编辑团队的情感寄托。去年10月，在两书正式立项之后，我们将李炜教授门下的18位学生李丹丹、和丹丹、石佩璇、刘亚男、黄燕旋、于晓雷、王琳、张荣荣、范培培、张超、林梦虹、杨靖雯、沈冰、洪妍、魏兴舟、王旭、徐飞翔、张佳浩分成了两组。

李丹丹担任两组的总统筹，黄燕旋担任《论集》的编写组长，和丹丹、石佩璇、刘亚男担任《追思集》的编写组长，于晓雷负责与出版社对接协调等外联工作。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诸位老师的指导下，两书的编写工作开始了。

书籍的编辑工作千头万绪，从收稿到整理再到一轮又一轮地校订，都是十分需要耐心和定力的工作。两书同时立项、同步开展，编辑校对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论集》的稿件年代有早有晚，体例不尽相同，许多细节条陈需要追根溯源、逐字校订；《追思集》的稿件长短不一、风格各异，许多人物、事件，特别是文字都需要逐一认真核对。

编写团队的成员，有些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科研以外，儿女尚小、家庭负担也较重；有的是在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正处于毕业论文撰写和求职的关键时期；还有的成员在北京、贵州工作，参与开会讨论多有不便。但是大家心照不宣，都把这份特殊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于是，编写团队中有深夜一两点完成编写发送到工作群里的，也有凌晨四五点起床来接力编辑校对的，每个人都尽力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挤压休息的缝隙，在接力中完成全书的编写。在老师们的指导下，编写团队兵分两路开展整理编辑工作，汇总后再与出版社责任编辑团队对接，按期完成了出版前的整理校对工作。支持我们克服所有困难、完成攻坚任务的，是心中怀有的对恩师深沉坚定的爱。

正因为怀着这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对书中的细致处用心甚多，此外另列两处，一为全书的排序原则，一为新增的“各界寄语”板块。

《追思集》的文章来自社会各界，排序工作成为难点。一般来说，按姓氏音序先后、职称职务高低是较常见的排序原则，但我们选择的是“以齿为序”。“以齿为序”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优良传统，也是李炜教授的处事原则。因而在“同事追思”“学界追思”“亲友追思”中，我们遵循了该原则。

但在师生关系中，我们对“年龄”的概念做了延伸。本书中的“学生”，主要定义是“李炜教授的学生”，因而在“学生追思”和“学生寄语”中，我们以入学年份先后作为主要的排序依据，入学年份意味着“结识李炜教授的年龄”。在“各界寄语”中，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了“相识年龄”这个原则，根据撰稿人与李炜教授的相识年份排序。希望借此时间线索，展现李炜教授人生轨迹及情之所至。

在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报刊公众号转载的文章下面，有很多留言感人至深，这些留言来自社会各界。这让想到，除了“师长、同事、亲友、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可能被忽略的“交往”。

回忆起李炜教授的告别仪式上，他生前经常光顾的餐馆老板、中文堂的物业管理人员，仅指导过一两次演讲的外系学生，还有一些交往时间不长的好友也在送别人群中。这些短暂的、日常的交往，李炜教授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现他们之间的过往，可以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的李炜教授，于是我们设立了“留言板”，记录李炜教授与社会各界的交往。

有些邀请对象从没有写过文章，我们就安排专人采访，并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于是在最初的“留言板”中，就有了和李炜教授结识多年的理发师刘宾先生、家政服务人员刘自香女士的故事。

在编辑过程中，“留言板”收集的内容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有李炜教授在日本访学时结识的忘年友人卢燕丽教授，有学生家属，还有历届学生。于是编委会将“留言板”单独成篇，命名为“各界寄语”。在这些留言中，我们感受到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广东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之外的李炜教授，感受到他“侠义之气”“与人为善”的生命底色。这些交往的故事更加印证了李炜教授是一个“明媚了周边世界的人”（中山大学彭玉平教授语）。

在《追思集》中，有多位师长前辈提及李炜教授最后住院的一百多天，是由多位学生在医院照顾陪护的；李炜教授逝世后，也是门下学生执传统弟子礼，为李炜教授送终发丧的。然而，比起恩师对我们的培养教导，我们仍未能报之于万一；比起恩师对导师黄伯荣先生、唐钰明先生的恭敬尊重，我们也未能效之于万一。

“因风感谢，情至笔载援”，愿借《李炜汉语语言学论集》与《李炜教授追思集》两书，表达我们对恩师永远的感激、怀念之情。

周劭

时光如同薄纸，滤掉的大多是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平常，这就如同我们得病时需要吃药，而往往鲜少知道这个药是何人发明的；而那些救活人性命的神奇的手术，又是由何人首创？随着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国的中医药走向世界的现状，以及院士遴选制度，一时间都成了社会的焦点。

其实，医学界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容易被忽视，这一批真正可以用“爱国”与“卓越”来形容的老知识分子。这是我负责的团队历经两年有余，对这些可敬的“两院”院士做口述历史的过程中最直接的感受，甚或是一直憋闷在心底的嘶喊。

2002年，中国医学界当时健在的“两院”院士共有40余位，我们先后接触、访问了37位，他们当时的年龄从60到90多岁不等，在整个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最大的共性有二：

其一，他们一致爱国。像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胸病及心血管外科奠基人吴英恺，作为美国一家大医院的首位华裔外科主任，当全面抗战开始，他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冒险坐上装满弹药的船先到好望角，穿过纳粹深藏在大海里的潜艇防线，然后再一路跋涉到印度，乘坐军机飞越“死亡航线”驼峰线到重庆。临行前，美国的院长竭力挽留：“你留下了就可以接我的班了，再说中美都是盟国。”吴英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残酷，那里是我的国家。”

在访谈时，老人极少谈在重庆给蒋介石、宋子文这些显要人物治病，谈的多是如何医治伤员和平民。都到了92岁高龄了，吴院士仍坚持每周两次到医院看普通门诊。须知，在世界范围内，有30多种手术的首例都是由他实施的，他是一位“让院士们崇拜的院士”。

第二批像周同意、王世真、薛社普、梁植权、吴阶平等等院士，他们都是20多岁在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从事着待遇优渥的研究工作。1949年，他们集体向美国总统写信强烈要求回国。由于他们中不少人是从事核医学等前沿学科研究，一直拖到20世纪50年代才由周恩来转旋，用朝鲜战争的美军战俘交换回到了国内。

第三批像吴宪、刘耕田、巴德年、于德荣、朱晓东等院士，都是20世纪50年代后或是出国留学或是长时间在国外从事研究工作。

其二，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是“鲑鱼返乡”式的决绝归国。鲑鱼嗅觉灵敏，能从800万升的海水中分辨出家乡水的味道，一旦嗅到家乡水的味道，即刻就逆流而上千里洄游返乡。那种壮行是真正的赴死舍生——成功返乡的鲑鱼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一，其目的就是回到祖先聚居的那块砾石滩孕育繁衍。一边要决绝归国的科学家们，心心念念的无外是：报效国家，服务同胞！

我有幸亲近院士这个伟大的群体，并按照国际口述史协会的访谈规则完成了部分院士的口述历史。我们开展这项工作的目的是：为科学史立传，为科学研究立言，为倡导科学精神立德。

关中英济有云：日子好过，遇合难。就是说再好的事情，碰不上合适的合作伙伴都是枉然。从这项工作的开始至今，我算是有幸之人：从筹划这个项目时，就巧遇了时任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刘刚和李德福，是他们这间民营企业慷慨地为访谈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才使得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在国内第一次用口述史的方法完成这一颇具规模的访谈工程，首先感谢他们。其次要感恩我们这个团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境遇非亲历者难感知。顾国明这位亲如家人的老大哥，用他的学识与睿智力亲为，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访谈；像“睡在下铺的兄弟”一般的张兴杰，一边要访谈，一边还要掌机拍摄所有的访谈对象；而无论平素工作多苦多累，总是一脸笑眯眯的艺术家舒阳老师，甚至至今记得他背着一个大包匆匆奔忙的身影。特别要感谢的是负责沟通、联络院士们的张俊敏博士，她的负责认真令我动容——访谈开始时她刚身怀六甲，而现在书要出版了，她的宝贝女儿也要上高中了。她留给我的记忆则是：平日里抱着日渐沉重的身子，上车下车，风来雨往……

《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这本书能顺利面世，更要感谢老友郭银星博士和她的同事曹辉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是大家拾柴，方为这个多舛的“新生儿”抱起一堆温暖的篝火。

听医学界院士话仁心仁术